

论佛经翻译的译场

徐天池

(四川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成都 610068)

摘要:译场译经是我国近千年佛经翻译的主要形式,在佛经翻译事业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译场译经使佛教经典得以保存,增进了信众对佛经义理的理解,涌现并培养出了大批翻译人才,促进了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对汉语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佛经翻译;译场;作用;影响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7)04-0091-05

我国的翻译历史上,佛经翻译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在近千年的佛经翻译过程中,译场译经是其主要形式,译场在佛经翻译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要研究我国佛经翻译的历史,对佛经翻译的译场进行探讨是十分必要的。

一 译场译经的历史概述

中国佛教史上的译经事业,始于东汉末的安世高。安世高系安息僧人,于桓帝建和(147—149)年间来华,至灵帝建宁(168—171)年间的20余年之间,译出《安般守意经》、《明度五十校记经》等30余部、40卷佛经^[1]。稍晚于安世高的月支国僧人支娄迦谶和三国时期的支谦,也先后译了《般若道行经》、《般舟三昧经》、《阿弥陀经》等数十部佛经。其时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还不长,传播还不很广,所翻译的佛经也只是来到中国的胡僧所能够背诵及随身携带的经卷,有什么就翻译什么,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也说不上有什么周密的安排与计划。

西晋时期(265—317)的竺法护曾随师游历西域诸国,后携带大批胡本佛经来到长安,翻译佛经20多年,译出《正法华经》、《方等泥洹经》、《光赞般若经》等150余部佛经,是至此译经数量最多的佛经翻译家。此时佛经翻译的方式,已经具有译场的

雏形。译经在固定的寺庙进行,有主持人,有分工明确的助手。东汉至西晋是我国佛经翻译的初期。在这段时期,虽然到中国的译经僧的人数不少,也翻译出了相当数量的佛经,但佛经的翻译还只是民间小规模的事业,没有官方的参与。

佛教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到东晋初年,传播时间已有300余年。统治者看到了佛教对维护、巩固自己的统治的好处,也开始信奉并提倡佛教,佛经翻译也从民间的私人事业转为官方的有组织的活动。官办的译场开始正式建立,译经的数量和质量都大幅提高。到了南北朝时期,由于朝廷的扶持,译经成为国家的大事,朝廷甚至还常常下拨一笔相当数目的款项来支持译场的译经活动,译场译经的翻译形式得以进一步发展。

东晋十六国时期(317—420),前秦皇帝苻坚信佛。他聘请中外名僧,组建译场,开始有组织地进行佛经翻译。当时东晋名僧道安在襄阳从事佛教活动,苻坚久慕道安名声,“方欲致之,以辅朕躬”^{[2]181},遂于前秦建元十五年(379)发兵10万,攻陷襄阳,将道安带至长安。公元380年,道安主持长安译场,聘请外国僧人僧伽提婆、昙摩难提及僧伽跋澄等前来翻译佛经。在道安弟子僧念、僧睿、僧导、

收稿日期:2006-12-20

作者简介:徐天池(1951—),男,四川成都人,副教授。

慧嵩等的协助下,数年间译出《四阿含暮抄》、《婆须蜜》、《增一阿含经》等佛教经典共百余万言。此为 中国佛经翻译的官办译场的开端。

后秦君主姚兴笃信佛教,比苻坚更甚。后秦弘始三年(401),姚兴打败后凉,将滞留在凉州 10 多年的天竺高僧鸠摩罗什迎请到长安,并在长安逍遥园建了规模宏大的西明阁,专为鸠摩罗什译经之用。姚兴为鸠摩罗什派去僧肇、僧略、僧邈等 800 余名助手,自己还亲自参与译经。加上前来学习、观摩、讨论的僧俗信众,在鸠摩罗什先后主持的逍遥园和大寺两个译场中,参与的人数最多时达到 3000 之众。译出《大品般若经》、《法华经》、《金刚经》、《阿弥陀经》、《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 70 多部 300 多卷佛教经论。

南北朝(420—589)时期,南方和北方的各个割据政权的君主大多信佛,极力扶持佛教,佛法大兴。南北双方都广设译场,翻译佛经,出现了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菩提流支、真谛等一大批佛经翻译家。其中印度高僧真谛所取得的译经成就最为引人注目。真谛在梁、陈之际来到中国,先后在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等地组织译场翻译佛经。在宝琼、法太、慧恺、僧宗等的协助下,20 多年间翻译了《十七地论》、《摄大乘论》等 60 多部佛教经论。

隋朝的隋文帝杨坚和隋炀帝杨广都笃信并大力提倡佛教,在 30 多年中进行了大规模的旧经修治,并且设置了翻经馆,进行佛经翻译活动。隋朝译出的经论及佛录等,总共有 64 部 301 卷。在隋朝从事佛经翻译的翻译家有天竺僧人那连提黎耶舍、阇那崛多和中国僧人费长房、彦琮等。其中的中国僧人彦琮精通梵文,在长安大兴善寺和洛阳上林园两个译场主持佛经翻译,是我国佛经翻译史上在译场译经中担任译主的第一位中国僧人。

唐朝(618—907)是我国封建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高峰,也是佛教在中国传播、发展的鼎盛时期,佛经翻译的事业达到了历史的顶峰。唐朝出现了我国历史上佛经翻译的巨匠玄奘,还出现了不空、义净等佛经翻译大师。唐代的译场,特别是玄奘在长安弘福寺、大慈恩寺和玉华宫所主持的译场,组织更严密,分工更细致,译经也比以前有更强的计划性。唐朝封建经济的高度发达在译场建设上也有相应体现。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648)建造的大慈恩寺译经院极其富丽堂皇,唐代译场的软件和硬件都

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

唐朝佛经翻译的兴旺时期主要是在太宗贞观到德宗贞元年间(627—805)。在这段时期,玄奘、义净、不空等译经大师在长安、洛阳等多处译场共译出佛经 428 部,合 2412 卷。贞元以后,译场译经的高潮已过。后再经唐武宗李炎的会昌灭佛和五代时期(907—960)后周世宗柴荣的灭佛,佛教受到重大打击,译场译经的活动也基本上停顿下来。

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宋太宗赵匡义在开封太平兴国寺建立译经院,恢复了中断已久的官办译场的佛经翻译活动。北宋的译场译经活动从太平兴国七年开始,一直持续到神宗元丰五年(1082)。在这大约 100 年的时间里,先后主持译场翻译佛经的有印度僧人天息灾、施护、法贤、法护和中国僧人惟净、慧询等,共译出佛经 270 部,821 卷,数量相当可观。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废译经院,元丰五年(1082)罢译经史、润文官,宋代的官办译场的译经活动至此结束。宋代的太平兴国寺译场是中国最后一所官办佛经译场,宋代译场的结束标志着中国译场译经活动的彻底终结。

二 译场译经的运作方式与特点

中国从东汉到北宋持续近千年的佛经翻译,大多是以译场译经的形式进行的。不管是道安之前的民间译场,还是之后的官办译场,其运作方式都具有一些共同点,但不同时期的译场又各自具有一些自己的特点。

从历代译场的组织与分工情况来看,早期较为粗疏,晚期逐渐细密,大体上以隋为界。隋以前的译场译经,一般先由译主读出原经,再口译为汉语,由笔受逐一记录下来,然后再校订。如果译主是不甚通汉语的胡僧,那就得增加传语一职,其职责便是将译主读出并讲解的梵文或胡文原经口译成汉语。最后,译出的佛经还须根据原文仔细校勘之后方能成为定本。而隋以后的译场,组织分工比早期的译场细致严密得多。例如唐代译场的职司就多达 11 种。一是译主,为全场主脑。精通华梵,深谙佛理,遇有疑难,能判断解决。二是证义,为译主的助手。凡已译的意义与梵文有何差殊,均由他与译主商讨。三是证文,或称证梵本,译主诵梵文时,由他注意原文有无讹误。四是度语,根据梵文字音改记成汉字,又称书字。五是笔受,把记下的梵文字音译成汉文。六是缀文,整理译文,使之符合汉语习惯。七是参

译,既校勘原文是否有误,又用译文回证原文有无歧义。八是刊定,因中外文体不同,故每行每节每章须去其芜冗重复。九是润文,从修辞上对译文加以润饰。十是梵呗,译文完成后,用读梵音的法子来唱念,看音调是否协调,便于僧侣诵读。十一是监护大使,钦命大臣监阅译经^{[3]147-148}。

宋代译场的组织制度基本上沿袭唐代,但分工更为合理、制度更为严密,宗教气氛更加浓厚。

从译场的运作方式来看,隋以前的译场规模较大,人员较多,但译经效率较低;而隋以后的译场规模较小,人员较少,但译经效率较高。

隋以前的译场译经最突出的特点是“讲译同施”^[4],译经与讲经同步进行。以后秦的译场为例。译经时鸠摩罗什法师手持佛经梵文原本,一边将其口译成汉语,一边反复讲解,同时,在场的人员也提出各种问题,与之进行辩论。译经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讲经、辩论、释疑的过程。译主不仅要译经,而且还要讲解、阐述佛经中的奥妙,发挥其中的精微。译主如果不是像鸠摩罗什这样的精通佛学的大师,实在难以胜任这一重责。由于译场又是开放性的讲经学府,因此前来听讲经的僧俗信众很多,译经就像开讨论会,在场的任何人都可以跟译主进行辩论。这种作法造成了译场组织的混乱,而对佛经翻译本身的帮助实际上并不大。“讲译同施”的译经方法在隋之前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还不是很长,僧俗信众对佛教义理的理解和掌握还不够深透的时候是必要的。通过讲经,信众对佛经蕴含的义理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但“讲译同施”的译经方法也大大地降低了译经的效率。

隋以后的译场不再采用“讲译同施”的译经方式,而改用由少数专家组成译场翻译佛经的方式。此时佛教的汉语话语系统已经形成,佛理已被许多僧俗信众理解,不需要过多的解释了。此外,高效、精简的小型译场也可以避免许多无谓的干扰。译场将与佛经翻译关系不大的讲经、辩论等过程分离出去,从而使得整个译经工作分工严格、合理,组织严密、紧凑。这种由专家组成的小型译场大大提高了佛经翻译的效率。同列四大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有助手3000人,共翻译了300多卷佛经,而玄奘仅有助手23人,却译出了1000多卷佛经。

三 译场译经的作用和影响

在中国的翻译史上,译场译经在佛经翻译事业

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也对中国文化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这些作用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五方面。

(一)保存了佛教经典。佛教是起源于印度的外来宗教。传入中国后,经过历代中外佛经翻译家近千年的努力,翻译出了在人类文化史上少见的浩如烟海的佛经典籍。佛教13世纪在其发源地印度基本消亡,那些写在贝多罗叶上的梵文佛经原本也由于种种原因,大多损坏亡佚,因此佛教的经典主要是依靠译本而流传至今的。中国的译场译经活动在保存佛教经典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增进了信众对佛经义理的理解。“讲译同施”的译场译经方式虽然降低了译经的速度,但通过译主的讲解与释疑,参与译经的僧俗信众的质询,提问和辩论,澄清了问题,辨明了佛理,译场内对新译佛经的内容和蕴含的佛理有了较深刻的理解,避免了对佛经的误解和谬种流传。

(三)涌现并培养出了大批佛经翻译人才。支娄迦讖、支谦、竺法护、道安、鸠摩罗什、真谛、彦琮、玄奘、义净、不空、天息灾等都是主持译场翻译佛经的大师。他们在译场从事佛经翻译活动的同时也培养出了僧念、僧睿、僧导、慧嵩、僧肇、僧略、僧邈、宝琮、法太、慧恺、僧宗、嘉尚、法宝、僧圆测等翻译人才,使他们之后的佛经翻译事业后继有人。北宋时期的天息灾还充分注意到培养外语人才的重要性。他在太平兴国八年(983)向朝廷上书,建议在京城选拔50名儿童,学习梵文,以储备翻译人才。宋太宗采纳了这一建议,从500名儿童中选出50名送入译经院学习,后来其中的惟净、澄珠、文一等人均学有成就,并参与了译场译经。

(四)促进了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前秦道安主张直译。梁启超认为,道安“乃其论译事,务主质朴。质而言之,则安殆主张直译之人也”^{[5]275}。道安提出了译经的“五失本”,“三不易”之说。他指出,在将佛经从梵文译成汉语时,有五种情况允许译本与原文不一致:“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也;一者,胡言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三者,胡经委悉,至于叹咏丁宁反复,或三或四不嫌其繁,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义说,正似乱词,寻检向语,文无以异,或一千或五百,今并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以合成,将更旁及,反腾前词,已乃后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同时,他认为翻译

佛经有三方面是不容易做到的:“智经三达之心,覆面所演,圣必因时,时俗有易,而删雅古以适今时,一不易也;愚智天隔圣人叵阶,乃欲以千载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阿难出经去佛未久,尊大迦叶令五百六通迭察迭书,今虽千年而以近意量截,彼阿罗汉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平平若是,岂将不以知法者猛乎,斯三不易也。”^{[6]80-81}王秉钦认为,五失本是“反映了译家在‘译梵为秦时’,充分认识到两种语言的差异和思维方式的不同而作的变通”,而“三不易则反映了译家译梵典的难易观,反映了译家对古梵文和古圣先贤的玄奥哲理洞入幽微,能究深隐,化难为易。可以说五失本、三不易正是道安的翻译辩证法思想的科学体现”^{[7]10}。此外,自汉至晋,翻译出的佛经已经很多,但传经人的名字尚无人著录,结果后人便弄不准各经传来的时代和译经人的姓名。道安有感于此,便汇集诸经名目,标明传译者,注明新旧,撰成《经录》。这在中国还是首例,为后人开了先河^{[8]35}。

后秦译经大师鸠摩罗什主张意译。正如梁启超所说:“凡什公所译,对于原本,或增或删,务在达旨。”^{[5]185}鸠摩罗什认为,梵文辞体华美,可以配以音乐诵唱,但直译入汉语后,译文虽然还能保存原义,却失掉了那份美感。经中偈颂,本应配合音乐吟唱,但直译成汉语,则好似嚼饭给人吃,非但没味,而且令人恶心呕吐。鸠摩罗什译经不但要译出原意,同时还力求文字通俗化,兼富优美文学色彩。《法华经》是一部佛经,也是一部极富文学趣味的书,书中的寓言是世界文学中最美的寓言。鸠摩罗什翻译的《法华经》忠实地再现了原文的风格,译本的读者完全可以体会到原文的语言特点。他的译本已成为中国佛教翻译文学的名著,流传至今^[9]。此外,鸠摩罗什还主张译者署名,以负文责。

隋朝的彦琮在其所著《辩证论》中提出“八备”:
“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禅久时,其备一也;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其备二也;筌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暗滞,其备三也;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其备四也;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其备五也;耽于道术,淡于名利,不欲高炫,其备六也;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其备七也;薄阅苍雅,粗谙篆隶,不昧此文,其备八也。”^{[10]29}彦琮的“八备”说在我国第一次较全面地论述了译者本身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问题,对译者的品德修养和学

识水平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些要求对我们今天的翻译工作者来说也是完全适用的。正如汤用彤先生所指出的:“凡此诸项,即执以绳现代之翻译,亦为不刊之言。”^{[11]76}

唐代的译经大师玄奘主持译场翻译佛经 1000 多卷。他不但把佛经从梵文译成汉文,而且把《老子》译成梵文,成为第一个把汉文著作翻译成外文介绍到国外的中国人。玄奘主张直译和意译的完美结合,在佛经翻译中将直译与意译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梁启超评价说,“若玄奘者,则意译直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也”^{[5]188}。玄奘在译经中还熟练地运用了补充法、省略法和假借法等翻译技巧。他认为佛经的译文既应忠实准确,又应通俗易懂。同时,玄奘还对佛经翻译定下了“五不翻”的原则,认为有五种情况不宜意译而宜音译:一、秘密故,如“陀罗尼”;二、含多义故,如“簿伽”,梵具六义;三、此无故,如“阎浮”树,中夏实无此木;四、顺古故,如“阿耨菩提”,非不可翻,而摩腾以来,常存梵音;五、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轻浅^{[12]1}。

玄奘的“五不翻”原则,详细规定了佛经翻译中音译的应用范围,对于我们今天在翻译工作中恰当应用音译仍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五)译场译经对汉语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随着许多佛教经典的译出,大量与佛教有关的词语进入了汉语词汇。我们今天使用的成语有许多来自佛经翻译。例如:天花乱坠、不二法门、不可思议、盲人摸象、作茧自缚、随机应变、心心相印、现身说法、五体投地、心花怒放、昙花一现、三生有幸等^{[13]173}。这些随着佛经翻译而进入汉语词汇的成语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词语。隋唐两代是译场译经的鼎盛时期,据统计,仅在这段时间里,翻译佛经所新创的词汇与成语,就达数万之多^[14]。在译场译经过程中创造的新词汇,丰富了汉语的表现力,促进了人们的思想交流,在国人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除了给汉语注入新的词汇,丰富汉语的表达手段以外,译场译经还对汉语的句式结构发生了影响,推动了汉语向口语化的方向发展。佛经翻译没有采用汉魏六朝时期文人普遍追求的绮丽的骈文句式,而引入了梵文中的倒装、设问、解释等句型。汉译佛经中几乎看不到“之”、“乎”、“者”、“也”、“焉”、“哉”之类的文言虚词,却可以找到不少汉语口语中

常用的“把”、“着”、“了”、“便”、“就”之类的词语。这些汉语书面语的新型句式结构促进了唐人传奇、宋人话本和明清白话小说的产生和发展。

在我国长达近千年的佛经翻译活动中,译场译经一直是其主要形式。不论是早期的民间译场,还是后来的官办译场,不论是隋以前集讲经与译经于一体的大规模译场,还是隋以后的专家型的小规模译场,译场译经在佛经翻译的事业中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译场译经不但完成了浩如烟海的佛教经典的汉译工作,而且在中国的传统翻译理论的形

成和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译场译经还丰富了汉语的表达手段,促进了汉语的发展。佛经翻译成为了我国翻译史上三大高潮的第一个高潮。佛经翻译的译场是我国佛经翻译历史的重要构成部分,要研究我国佛经翻译的历史,就不可不对译场翻译佛经的过程和形式及其作用和影响进行探讨,而译场译经的翻译形式在我们今天对译者的素质培养,以及在翻译工作中的组织分工和步骤安排等方面也是不无启发和借鉴作用的。

参考文献:

- [1]林传芳.格义佛教思想之史的开展[J].华冈佛学学报,1972,(2).
- [2]释慧皎.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2.
- [3]马祖毅.中国翻译史(上)[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 [4]曹仕邦.中国佛教的译场组织与沙门的外学修养[M].中华佛学学报,1999,(12).
- [5]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6]释道宣.唐高僧传.赖永海释译[M].台北:佛光文化实业有限公司,1998.
- [7]王秉钦.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 [8]李山.历代高僧传[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
- [9]刘祥清.佛经汉译的历史和作用[M].中国科技翻译,2006,(8).
- [10]普润大师.翻译名义集[M].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9.
- [11]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12]周敦义.翻译名义集序[M].普润大师编.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9.
- [13]史有为.外来词:异文化的使者[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
- [14]吴平.佛教与隋唐文明[M].华夏文化,2004,(2).

On Translation-Centers for Buddhist Scripture Translation

XU Tian-chi

(Foreign Languages Institut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In th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s that lasts about a thousand years, translating in translation centers is always the chief form of operation which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s. It contributes to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Buddhist scriptures, enhances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he Buddhist doctrines and brings into being a large number of talented translators. Meanwhile, it helps to promote the formation and growth of China's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heories and to some extent influenc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Key words: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s translation centers role influence

[责任编辑:张思武]